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25日至26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⑪8

阿斯尔

印记
YINJI

“驿”与“站”的演变与融合

□王宗

“驿”与“站”,在现代汉语体系中是孪生词,称为“驿站”。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别看“驿”与“站”只有一字之差,两者的相遇、相知、相融,却整整等了2600多年。

“驿”与“站”的演变与共生,讲述了一段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和合共鉴的佳话。

元朝之前,“驿”是中原王朝传递政令、通达边情的官道血脉。西周置邮,秦设亭传,汉置驿骑,唐修馆舍,制度日臻完备。那时,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以穹庐为舍”,经年累月踏草为路,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自然通道。两种路,两种文化,各自生长。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元朝。元朝以大都和上都为中心,在全国设立各类驿站1500余处,草原上“逐水草”的自然路,第一次被纳入国家驿路网络的骨架。驿站不仅仅是军令传递的中转,更成了连接漠北、中原与西域的“神经末梢”。

真正的融合,发生在元朝以后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燕家梁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元朝驿站繁华的窗口。这处位于河套平原、黄河“几字弯”顶端的水陆驿站,2006年出土了交错的道路、布局有致的房址,以及“太和馆”“仁和店”等酒肆客邸的墨书题记。元朝在这里设立了水陆驿站,来自中原的瓷器、南方的茶叶、漠北的皮毛,都在此转运交易。帆船林立、骆驼穿梭,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人们在同一片屋檐下歇脚、饮酒、谈生意。燕家梁遗址出土的元朝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如今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一抹幽蓝,正是元朝驿路畅通、商旅往来的见证。

语言的变化最能说明。“站”并非汉语原生词,而是源于蒙古语“站赤”的音译。元朝建立后,这个蒙古语音译“站赤”随着庞大驿传系统推广,而进入汉语。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试图恢复使用“驿”,但“站”字在民间已根深蒂固,最终形成了“驿站”连称。清代以后,“站”成了官方用语——康熙年间在内蒙古设立五路驿站,“站”与“驿”已经可以混用。

我们今天说的“站”,含义已远超古代。从汽车站、火车站到加油站、服务区,“站”字剥离了古代特指官办通信的属性,转而泛指一切中途停留、中转或服务的公共设施。这个转变,标志着“站”从行政术语,演变成一个极其普遍和日常的汉语词汇。

一个词的出现,背后是两种文化在漫长岁月里的相互接纳。

2025年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万里茶道最新考古成果,梳理出内蒙古境内7条主要线路,发现驿站、寺庙、商铺、会馆等遗址197处。张库大道、阿尔泰山台驿路、公主路、绥新驼道……这些名字里,既有官修的“驿路”,也有商旅路出的“商道”。公主路从归化城至库伦,经39站、长约1435公里,在四子王旗北部与阿尔泰山台交汇后进入蒙古国——官道与商道在此交汇,军令与茶叶同行。

伊林驿站是万里茶道上的一处咽喉。2017年的考古发掘中,这里不仅出土了“乾隆通宝”“大清铜币”,还有蒙古国钱币和日本钱币。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纸质文物——不仅有中文报纸,还有蒙古文、俄文、日文报纸。这哪里只是一个换马的驿站?这分明是一座欧亚大陆的信息港,是一个微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驿”的森严到“站”的包容,从军令的传递到茶香的流转,这条路上走过了敕使、商贾、僧侣和牧民。他们或许语言不通,但脚下的路是通的;他们或许信仰各异,但心中的“道”是通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们早已在这条驿路上完成了血脉与文化的交融,最终汇成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

一言
YIYAN

让传统音乐更好地传承

□及庆玲

阿斯尔,是多民族文化交流、文化互鉴的音乐实证。2014年,阿斯尔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重新绽放出耀眼光芒。

长久以来,人们谈及蒙古族音乐,最先想到长调、呼麦,阿斯尔时常隐匿在大众视线之外。作为丝绸之路上流动的音符,它始终保有兼容并蓄的品格,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此相遇、磨合、共生,没有生硬的拼接,只有如水一般自然的交融,让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在交流互鉴中绵延生长。

阿斯尔沉稳悠扬的曲调,提醒我们回望来路:丝绸之路既是商贸通道,也是音律交融之路。西域筚篥传入中原,中原礼乐远播四方,不同地域的曲调彼此吸纳、互为滋养,造就“洛阳家家学胡乐”的文化盛景。千百年的实践早已证明,音律没有国界,美好的音乐总能跨越语言、地域与习俗的隔阂,唤起人们心灵深处共同的情感。一代代先民以乐抒情、以乐记事。这些跨越时光的曲调,不只是艺术旋律,更是民族的历史史诗、生活图景与精神追求。新时代的文化交流,正需要这样温柔而坚定的载体。当中国传统民乐登上国际舞台,当本土古乐与海外旋律同台合奏,一曲和鸣,便是文化之间真诚的对话。

许多传统乐种依靠口传心授延续至今,一旦弦歌中断,一段文化记忆便可能消散。唯有持续做好活态传承,才能让阿斯尔长久回荡。做好传承,要守住这份兼容开放的文化智慧。那些流淌在曲调里的音韵、根植于乡土的表达,不只是艺术样本,更是一代代人不间断纳、交融、演化而生的精神结晶。当下,要在尊重传统根脉的基础上,敞开怀抱接纳时代的新风,让本土特色能够与不同文化对话,容纳多元表达,既要主动奏响中华古乐,向世界讲述源远流长的东方美学;也要静心聆听世界各地的民间乐声,在交流中取长补短,让古老乐声持续回响。



阿斯尔老年音乐团日常排练。

漠野弦歌 交融回响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龚再琦

溯源寻踪阿斯尔

阿斯尔是蒙古语“阿斯如温得尔”的简称,意为“至高无上”。它是流传于锡林郭勒盟南部原察哈尔地区的一种古老器乐合奏曲,被视为蒙古族宫廷音乐的精髓部分。

有关文献记载,阿斯尔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西征时期,曲目有《大汗阿斯尔》《锦绣阿斯尔》等。到了元朝,阿斯尔正式进入宫廷,成为皇家宴乐的一部分,并随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吸收了汉族、满族等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及词牌的元素。元朝北迁后,察哈尔部继承了这一音乐传统。

清朝时期,察哈尔部被分割为12个旗、牧群,每个旗、牧群都在继承察哈尔宫廷音乐的基础上,演变成新的音乐——阿斯尔,形成了

阿都沁阿斯尔、明安阿斯尔、太仆寺阿斯尔等不同地域风格的曲目。

阿斯尔在传承中,以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进行——官方以王官府“乐班”演奏,一代代乐师相传;民间以师徒相传为主。因此,阿斯尔既有宫廷音乐的庄重典雅——乐曲结构紧密细腻,转调自然,风格高雅悠扬;又有民间音乐的鲜活气息——古朴典雅中透着喜悦活泼,欢快中趋于平稳,热烈时秀美隽永。这种双重基因,使它区别于纯粹的单一体裁,成为融合的艺术。

现今,镶黄旗被誉为“中国阿斯尔音乐之乡”。镶黄旗所在的察哈尔草原曾为皇室牧场,常在寿庆宴会、婚礼以及官吏晋升等重大

礼仪性场合时演奏阿斯尔。

在阿斯尔的演出中,乐手们不是只演奏单一曲目,而是将多首不同曲目按照特定的顺序和调性编排,一气呵成地连续演奏下来,中间没有明显停顿,乐手们在转调中完成自然的情绪过渡——从第一首的庄重典雅到第二首的欢快热烈再到第三首的沉稳隽永,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套曲”。

2026年锡林郭勒盟春节联欢晚会上,乐手们以连奏方式演绎了《太仆寺阿斯尔》《古日班阿其图》《乌木赞丹》三首曲目——一曲接一曲,尾音连起音,中间没有中断,一气呵成,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绝处逢生续薪火

门传统音乐技艺正在被活态抢救。

2006年,镶黄旗开展阿斯尔、火不思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学开始接触火不思、马头琴、古筝,到初中就能加入阿斯尔乐团排练。2023年,镶黄旗初级中学被认定为“阿斯尔音乐传承基地”,阿斯尔传承班现有学生30余名。

镶黄旗搭建起“老中青”三级传承梯队。“乐团成员不仅是演奏者,更是活着的文化档案。”阿斯尔老年音乐团团长岱青介绍,音乐团成立于2020年,现有18名成员,平均年龄65岁,涵盖教师、牧民等人群。2021年,音乐团启动“阿斯尔技艺抢救计划”,已收录10余首濒临失传的曲目及相关民俗故事。

7月11日,“交融与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在镶黄旗举办。80余位专家学者从北京、呼和浩特等地赶来。一大早,已经78岁的国家级非遗阿斯尔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便站在镶黄旗国家级非遗阿斯尔展馆门口等待学者们的到来。随后,他如数家珍般为大家介绍每一件展品。当一把旧马头琴出现在大家眼前,艾日布深情地说:“琴杆被手指常年握持磨

得陷下去一块,弓毛断了几根,却还绷在琴上。这便是阿斯尔的魅力,它不是固守一隅的声音,而是在交融中不断生长的文化印记。”

当晚,阿斯尔老年音乐团的18位老乐手与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课堂”的20余名小乐手同台献艺。孩子们手中的乐器——黑勒胡尔、四胡、陶布秀尔,格外引人注目。

黑勒胡尔,是元朝传承至今、察哈尔部落专属的古老马尾弦外胡琴。作为阿斯尔音乐的灵魂乐器,它是区别于科尔沁潮尔、现代马头琴的独立乐器分支,承载着察哈尔王府礼乐文化的厚重记忆。由于历史变迁,黑勒胡尔曾经历经百年衰落。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教授田玉英不由得感叹:“没想到国家级非遗阿斯尔在镶黄旗保存得这么好。”

目前,镶黄旗共有国家级非遗阿斯尔代表性传承人1人、自治区级非遗阿斯尔代表性传承人2人、盟级非遗阿斯尔代表性传承人3人、旗级非遗阿斯尔代表性传承人12人,他们和民间艺人一起共同续写着阿斯尔的故事。

(图片均由镶黄旗融媒体中心提供)



非遗传承课堂上,乐手指导青少年学生演奏。

上世纪后半叶,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年轻一代审美变迁,阿斯尔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如今,依靠校园传习、匠人复原,阿斯尔这



“乳香共融 乐享北疆”国家级非遗阿斯尔主题音乐展演现场,老、中、青三代文艺爱好者同台合奏。